

# 记忆的微光：理解社会及其记忆的一个入口

刘亚秋

**摘要** 对“记忆的微光”的研究缘起于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实践，用于刻画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间的关系，探求在记忆与遗忘的缝隙间闪现的“微光”的意义和价值。“记忆的微光”深藏于人与社会的互动之中，立足于人自身，且通过自内而外的发力，成为探求构建自我和社会/世界间关系的路径。自我内在于文明之中，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最具根性的力量，其他力量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记忆主体借助的主要不是理性的力量，而是过去某个物件在当下的遗存，循着蛛丝马迹，找回支撑生活/生命的本质。这一过程呈现了一种自内而外构建社会的知识图式，描画了人类文明和知识生产的幽微机制。

**关键词** 记忆的微光 自内而外 直觉 自明

作者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05-0125-13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一）缘起

“记忆的微光”概念是探寻当代社会生活“奥秘”的一个路径。它从记忆的角度，探索在记忆与遗忘的缝隙间闪现的“微光”的价值。无疑，它是片段和碎片，是不连续的，即便如此，记忆的微光仍为我们提供了窥见意义总体性的可能性。记忆的微光之于认识生命和社会生活的作用，如同齐美尔在《货币哲学》的序言中所说的，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中都存在着发现意义总体性的可能性。<sup>①</sup>

在研究现代性的一些作家当中，如齐美尔、克拉考尔、本雅明等敏锐地观察到，由于人们感受和体验资本主义的剧变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表征，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一些不连续的体验方面，如分裂、混乱和迷茫。<sup>②</sup>戴维·弗里斯比认为，齐美尔、克拉考尔、本雅明的现代性理论属于探求“现代性的碎片”这一传统。它不同于传统主流社会科学范式，主流范式将社会作为一个客观实在，尤其是涂尔干的社会理论认为社会外在于个人，在研究方法上延续了孔德的社会物理学的观念；而专注于“现代性的碎片”的这一传统，没有像涂尔干那样，完全将“社会”从人类整体现象中抽取出来，而是采用一种跨学科方法，借用人文社会科学的已有成果更细腻地考察当代社会文化的状况，尤其是将人的生存处境作为考察的中心。

对“记忆的微光”的探查也属于这一传统。它以记忆为方法，考察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提出记忆的微光，意在回到存在的维度探寻人和社会间的关系。而存在的维度与物化和理性倾向愈益加强的文明之间构成一种紧张关系，后者对人性有各种挤压；在这种文明状态下，一切知识都被科学理念化，一切目标都被资本主义物化。从存在的维度出发，通过描述记忆的散乱微弱状态，来探索人性的复杂构成，同时保留人性

<sup>①②</sup> 戴维·弗里斯比：《导言》，《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1、8页。

的“柔软”之处。这类知识从属于生态学和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传统。简言之，记忆的微光是从人之存在角度探索人类文明多重面向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一维度在社会学的主流中长期被忽视，甚至被排挤。但同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并且绵延不绝，成为一个坚挺的存在，与主流社会学所关注的对象之间形成补充关系，同时与主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构成了对张关系，并提供了批判的武器和推进学科扩展界限的工具。尼采对社会学有一个批判：社会学只能从经验中了解社会的腐朽形态，其本身就是群居无能的一个征兆；它只是旁观自己的对象——社会的毁灭。<sup>①</sup>笔者认为，要更全面深入研究社会（以及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除传统社会学方法，还需要寻求其他方法。齐美尔在《感觉社会学》中运用了“心理显微术”的方法，他指出：“每一种感觉都以其独特的特征对社会存在的建构做出典型的贡献，其印象的细微之处与社会关系的独特方面相对应。”唯有通过独特的方法，才能达到“用其他方法不可能达到的社会学深度”。<sup>②</sup>

对这方面的探索尤为重要，因为它涉及人之生存境遇。从人的角度出发，去讨论社会和人的关系，构成人之自明知识的组成部分；在研究角度，其重要性如同尼采指出的，真正的哲学家/研究者的目的是保护人们免于命运的一切打击以及不测，并助力他们抵抗所有的惊愕。<sup>③</sup>

本文将“记忆的微光”视为理解社会及其记忆的一个入口，它在社会中广泛存在，构成了生活质地中的重要成分，以及人之生命的重要组成。但人们对其往往习焉不察、视而不见，因此本文有这样一个期待，就是通过进一步考察“微光”，由此探究一种认识社会生活或人之生命这一“总体性事实”的认知图式。

值得指出的是，很多人文学者对于人被挤压的状态都描画得十分深刻，其提出的解决方案各有不同，例如克拉考尔对这种状态持一种激烈批评的态度，但他自己尚未站在力图重建这个断裂的世界的立场上<sup>④</sup>；他的老师齐美尔作为都市中的漫游者，采用的观察方式是从关系漫游到关系，也不可能为心灵提供一个栖息之所，因为他与所有他解释过的现实都保持一种距离，从未投注过自己的灵魂，并且忽略了最终的决断，没有为我们的生命之流所应遵循的航线指明方向。<sup>⑤</sup>“记忆的微光”视角则试图通过记忆视角，深刻描画破碎的人性之一角，以关怀人之存在，同时，本文借助潘光旦的自明思想，站在人和社会重建的角度，提出洞察“微光”对于重建的意义，因为碎片化的世界实际上是一种脆弱的构造。<sup>⑥</sup>

## （二）脉络

对“记忆的微光”的研究缘起于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实践，是在探索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间的关系时发现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孙立平为首的“土改口述史”项目开启了社会学重建后的首次口述史研究，主要成果包括郭于华对“农村集体化时期女性口述史”的研究、方慧容对河北西村农民口述中的“无事件境”记忆的探讨，等等，可以说，这两个研究都是对个体记忆与宏大历史间关系的一个解释。在20世纪90年代末，王汉生主持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知青的生命历程”项目开启，其主要成果是有关知青集体记忆何以构建方面的研究。<sup>⑦</sup>该项目有一个重要发现，这便是提出了“记忆的微光”概念<sup>⑧</sup>，直接回应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但仍有很多值得讨论的空间。口述史研究方法在今天的社会学界仍保持较高的热度，这与2019年启动的周晓虹团队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等项目有着直接关系，最新一轮的口述史研究拓展了口述史在中国社会学中的领域和理论视角，例如提出了命运共同体、集体记忆

①③④⑤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第41、43、152、156—157页。

② 齐美尔：《感觉社会学》，《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3、14页；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第75页。

⑥ 潘光旦：《说童子操刀——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政学罪言》，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年。重建不仅需要自明，还需要“勇敢”，勇于承担，它是自我控制中的重要因素。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第42页。

⑦ 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2006年第3期。

⑧ 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2010年第5期。

的“既视感”等问题<sup>①</sup>，其中依然关涉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问题。

综合这些研究可以发现，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社会学口述史研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提出记忆的微光概念也是希望能对既有研究有一个突破，笔者2010年提出“记忆的微光”概念，认为记忆的微光是社会决定论与能动个体之间碰撞的产物，它描摹了另一种记忆的存在状态，提示着被忽视的现实洞察；2017年又对记忆的微光做了进一步讨论，指出记忆的微光是处理记忆与遗忘之间关系的尝试性概念，对记忆的微光的探索可归为对人性、人的境况以及人之存在条件的思考<sup>②</sup>；2021年《被束缚的过去》一书认为，记忆的微光部分揭示了个体记忆的被压抑状态，但不能因为“微光”处于“弱势”而去忽视它、否定它，要描述它的存在状态，并对其存在条件进行探索，从而为解放这一状态提供基础。<sup>③</sup>从目前看来，对于“记忆的微光”的讨论仍有很多未能言尽的部分。

那么，什么是“记忆的微光”？它是基于知青口述史研究的一个发现。在理论上，是对哈布瓦赫经典集体记忆研究传统的一个批评和补充。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研究属于涂尔干学派风格，其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本体”，因而对个体的能动性方面有所忽视。其理论中“社会如何制约人”的意味较强，而“人如何影响社会”方面则薄弱。也可以说，这一取向的研究“科学性”有余，而人文性有所不足。在研究实践中，笔者不仅发现个体极强的能动性，而且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在知青记忆中，不仅存在个体有意识地对过去的建构，以及对生活的调整，这些充分体现了主体能动性；还有一些个体“欲说还休”、甚至连自己都不明晰的部分，它成为阻碍个体表达的因素，因此被称为“被束缚的过去”，更有待于在理论上予以说明。笔者还发现，即便是在个体身上发现了它，但还不能仅从个体角度去解释它，也不能仅从社会角度去解释它，这两个视角都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综合个体和社会的视角，去探寻描画和解释这一现象也是本文的一个诉求。

从现象层面，“微光”来自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碰撞，个人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会出现种种不适或震惊，也包括喜悦、甜蜜，总之是人之存在意义上的。这些事件/事件感经由时间（岁月）的沉淀，经常隐去显在的形象而潜藏在个人的生命体之中，在接下来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偶然事件（借助一个物件，如一块点心、一个动作等）的激发，记忆主体可以重新发现过去，这个过去是个体的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代表了社会本身的某些特征。例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及的著名的小玛德莱娜点心茶，以及叙述者马塞尔的“弯腰脱鞋”动作。这类对生活记忆的提取方法被普鲁斯特称为是“非自主回忆”，可以视为一种回忆的方法论。而当“记忆的微光”作为一种现象层面的存在，它还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张力，例如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张力。作为一种隐喻提法的记忆的微光，或被称为是一种文学式的表达，但事实上，在记忆研究中，这种“隐喻”的表达方式是较为常见的，也是记忆理论创新的常见方法，如“闪光灯记忆”“羊皮纸记忆”，等等。

对“记忆的微光”的讨论尚存在理论提升的空间。当它作为描述一个记忆现象的概念时，不仅揭示了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呈现出一种人类文明形态的特征。对于后者进行理论说明，正是本文的任务。

## 二、“记忆的微光”与“无事件境”：两种不同形态的时间

“记忆的微光”更多是回到记忆现象本身的一个概念，试图描述人们在追忆过去的过程中，如何重启岁月；它是过去之从无到有的一个生产过程和机制。它重视记忆的过程，强调生活中的“关键细节”对于引发过去事件/生活的作用。

为了更好说明记忆的微光，可比照方慧容的“无事件境”概念。<sup>④</sup>无事件境是一个记忆的“结晶”，它提供的是一种相对稳固的形态，表达了一种文明的形式——传统农村的社会心态；而记忆的微光则还是一个记

① 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

② 刘亚秋：《记忆的微光的社会学分析——兼评阿莱达·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社会发展研究》2017年第4期。

③ 刘亚秋：《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导论，第4—5页。

④ 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回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生活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忆的散漫之“过程”，它似乎没有宣告什么，仅仅强调“微光”对于认识人类文明的作用，似乎并未明示是什么作用，因此，对于“微光”的说明有更大的难度。可以说，这两个概念都来源于中国社会口述史记忆研究的实践，从中也可以看到社会学传统中的两个不同的关注点。“无事件境”力图在生活的散乱叙事中打起一个结构性的因素，这是社会学主流叙事的努力。当然“无事件境”概念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打捞的失败，因为它似乎是一个“无”（结构）的存在，但笔者认为，它恰恰呈现为一种“结构”，事实上就是一种结构性的心态。记忆的微光则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它似乎只是一种有待捕捉的形态，难以描述，不过一直是社会学叙事中隐而不彰的存在。

具体言之，“无事件境”是方慧容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通过对河北西村的口述史研究得出的概念，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农村社会的心态。这一概念是通过比对“事件理论”得来的。埃利亚斯提示了文明的进程中，标准的时间的确立与人的事件感之间形成的关系；但是在方慧容的口述史访谈中，她发现了一种“无事件境”的传统心态，这便是人们建立事件感的“失败”：事件混杂在一起，并且经常互涵和交叠在一起，它呈现的是没有边界、没有区分的模糊团，如同水潭中的水滴。而“无事件境”直接源自一个她所观察的经典案例：农妇贾翠萍 5 岁时做童养媳，经常被婆婆用针扎；而在她 70 多岁被访谈员问及这段往事时，却认为这没有什么；有鉴于此，她甚至回忆不起一个完整的事件。方慧容认为，由于这件事（被婆婆用针扎）经常发生，事件之间是互涵和交叠的，形成了一种“无事件境”的结构，体现出这个社会的循环时间观。它是一种文明的心态。即方慧容通过这一口述特征总结出的无事件境，正是她所研究的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的心态，它与现代的（线性）时间以及事件的编排是不同的，后者是事件感的建立。

而“记忆的微光”则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记忆的微光”所属的知识传统，在社会科学中，一直是一个隐而不彰的传统。它一直存在，但少有学者拿出来做特别的说明。这种“微光”，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生活的关键细节的呈现。这种“细节”在很多社会学家那里有所强调。在正统社会学家中，例如在费孝通早期社会学的研究中，比较青睐某种细节叙事，例如他对《红楼梦》之深描笔法的偏爱，他还对人类学家把作品写成小说一样的读物深感赞叹。他在去往英国留学的路上，带着的就是《红楼梦》这本书；他在早期作品中对马林诺夫斯基的《野蛮人之性生活》的作品风格，以及芝加哥学派杨宝龄（Vislick Young）对俄裔移民的生活形态的细节分析深表欣赏（*The Pilgrims of the Russian Town*, 1932）。<sup>①</sup> 这或可称为一种对生活形态的分析，其多见于人类学的传统。不过，在中国社会学的传统中，定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密切合作，社会学家也可以通过参与观察等方法与人类学的风格形成合奏，这一传统，非常值得关注。可以说，“记忆的微光”也属于关注生活的细节这一学术传统。通过对“记忆的微光”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对社会学的这一传统有更为深入的体察。

同时，进一步分析“记忆的微光”也是对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一个反思。“记忆的微光”所在的传统与社会学视角下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传统有着较大的差异，前者基于个体认识社会的路径，后者则是从社会角度去认识个体记忆问题。可以说，对“记忆的微光”的学理分析，为我们认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理论视野。同时，本文认为，“记忆的微光”相比于“无事件境”，意味着文明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记忆的微光”从其定义上看，是需要捕捉的存在，它更意味着一种自内而外看世界的方式，是深藏于个体之中的；其与社会的关联路径，可表征为人类文明的一种特征，它是一种主体体验的时间线路图。对记忆的微光的探索可以丰富社会学的另类叙事模式。

### 三、作为动词的记忆的微光

微光可以被视为一种记忆的呈现状态；在“微光”的探查中，需要将“记忆”动词化，意味着过去的部分“重启”，从而记忆的或明或暗的状态才能得到关注。简言之，“记忆的微光”作为主观体验的时间形态，往往呈现为一种碎片状态，或曰是一个“瞬间”的闪现，就如同下文提及的小玛德莱娜点心茶的气味和滋味

<sup>①</sup> 参见费孝通：《〈野蛮人之性生活〉书后》《杨宝龄的〈美国城市中俄籍摩洛哥宗派之客民〉》，《费孝通全集》第 1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费孝通：《显微镜下切片素描》，《费孝通全集》第 2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

穿过岁月的长河，其在“瞬间”的闪现提醒了行为主体，但行为主体甚至一时难以捕捉到它，因为它在社会世界中缺乏稳固的支撑。它是记忆中的过去，并借助“瞬间”得以重启，确切地说，重启的是那些已经随着岁月沉寂的经验，是封存在我们的胳膊和腿中的记忆。其能够得以重启，也是人生幸事，因为我们终于与过去再次相逢；通过这次相逢，我们认识到生命的本质。

### （一）记忆的重启

将探查“微光”视为记忆的重启，前提是需要一个“类物质”给予人以“提示”，而类物质之所以能启动记忆，在于它调动了一种情感的力量。

这些“类物质”事实上就是普鲁斯特提到的“非自主回忆”中的那些小物件（或生活场景等）。例如，《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到的小玛德莱娜点心茶，它的（不随时间改变的）气味和滋味，就如同唤起过去的一束光，对于叙述者马塞尔的刺激最初是较为强烈的，即他品尝第一口后受到很大的触动，脑海中立即闪念出一种熟悉的味道，这种感觉却随着他品尝点心茶的次数增多而逐渐弱化。可见，这种转瞬即逝的提示弥足珍贵，因为即便有“过去之惊鸿一瞥”的感受，它也很难驻足，从而难以自发凝结为一个固态；它的更为常见的状态是随着瞬间感觉的淡化（失去）而又永远沉在海底。本文在这个意义上，称被唤起的这部分过去（感受）为“记忆的微光”的启动时的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说明“记忆的微光”概念时将多次引用《追忆似水年华》这部自传体小说。原因在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基于他自身生活和社会阅历而写成；而它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借助了一种他称之为“非自主记忆”的方法论，据统计，这类方法在其作品中出现10次以上。而所谓“非自主回忆”就是借助一些“类物质”，不由自主地唤起了对过去生活（品质/真相）的记忆。总体上，这种“非自主回忆”的方法是让“记忆的微光”固化的一种努力。

随时间而逝去的过去有如生活的幽灵，它好像消失了，但事实上是沉淀下来了；它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成为如影随形般的存在。我们凭借理性（指计划性、推理性）无法提取它，而需要一个“类物质”的激发，重启部分过去；这个“类物质”就是唤起过去的一束光，当然，这是一种个体记忆的过程。

如同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所提及的，我们生命的每个时辰一经消亡，就隐藏在某个物质客体中；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客体去认出它、呼唤它、释放它。这一客体也可以被称为主体性的“感觉”启发器。但是，当记忆被封存于这一客体中，此后我们也可能永远碰不上它，如果是这样的话，消亡的生命就会永远被囚禁。因为这些感觉及其客体太过于脆弱或微小，一旦坠入茫茫尘海，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再出现的机会微乎其微！<sup>①</sup>可以说，囚禁或被束缚，与记忆或唤醒，是两个运动。如果过去被压抑，就是被束缚和囚禁；如果有幸得到释放，那么就是过去的复活，于个人而言，可能就是一种救赎。

强调“记忆的微光”在于其中存在一种困境，就是这种“唤起”的机会在人的生命和生活中是微乎其微的；我们的生命呈现为片段，随着生活的流逝，大多随风而逝，永远不再回来。对于人来说，忘记是常态，反而记忆是非常态。所以，普鲁斯特几乎以毕生之力，复活他的生活和生命，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打捞出整整七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成为人类记忆研究史中的一座丰碑，也为本文进一步说明“记忆的微光”提供了经典案例。

《追忆似水年华》中被复活的过去之惊鸿一瞥来自一个冬天，当母亲拿给他小玛德莱娜点心和椴树茶后，他品尝一口便“启动”了他在贡布雷的童年生活的记忆，这些记忆就隐藏在对这块点心和这杯茶水的（似曾相识的）感受之中。<sup>②</sup>按照普鲁斯特的理论，这一（由物质引发的）感受也是囚禁过去的“客体”，而这一感觉的重新释放有如灵魂转世。

这类记忆/感觉释放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普鲁斯特在复活（释放）过去的过程中，也深感力不从心。他做过（有意识）记忆的努力，但有些过去永远无法追回。如他所说，“我对一生的各种感觉，朦胧的、已

① 马塞尔·普鲁斯特：《作者前言》，《驳圣伯夫：一天上午的回忆》，沈志明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② 周晓虹称之为“既视感”，参见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

知的，遗忘的，同时进行了犹豫不决的筛选，这只是片刻之间的事情。很快我眼前一片模糊，记忆永远沉睡了”<sup>①</sup>。为了追忆过去而重新获得力量，他徒劳地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然后猛然睁开眼睛，但眼前的树木向他表示不能说话的遗憾。而这让他产生焦虑，普鲁斯特唯恐永远遗忘那些一次性经历；唯恐忘却故人，而他们正向他伸出亲切而无力的双臂，仿佛在说：“让我们复活吧！”<sup>②</sup> 在这里，被复活的记忆就是一种情感的秘密，是回忆者人生力量的重新获得。

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类似小玛德莱娜点心茶这样的复活记忆之物不下十种。它们也是“记忆的微光”的重启媒介。类似体验在生命和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但几乎没有人能像普鲁斯特那样借助这类媒介构筑起一座追忆的大厦。

## （二）捕捉“微光”的方法

### 1. 抓住“直觉”让细节/瞬间可见。

正视熟视无睹的过去，将日常生活中的不可见“细节”变为可见。“细节”有如生命/生活长河中的“珍珠”，它们散落在河床；以结构化的方式去观察它们，它们就会“隐匿”。而社会科学提及较少的“直觉”方法则可以捕捉它。普鲁斯特将“直觉”的方法发挥到极致，并对科学传统称道的“理智”的方法做了较为尖锐的批评。<sup>③</sup> 他在《驳圣伯夫》的前言中提到，他对理智作用的评价正在与日俱减，他认为最重要是超越理智，才能重新抓住印象中的某些东西，而它才是触及人自身的东西。<sup>④</sup>

“记忆的微光”就是这类印象，它存在于我们的体验之中，有如“闪念之间”。这“闪念之间”的重启，往往就是生活的“细节”在发挥作用，这些细节往往无法被纳入一个（“理智”传统下的）事件的系列。

对“细节”的蛛丝马迹进行探查，关注的正是“生活世界究竟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所提供的，也正是他找到的表达自我与周遭世界之间关系的方式。<sup>⑤</sup> 普鲁斯特的研究者亚当·瓦特（Adam Watt）指出，当普鲁斯特的思想寻得独特的目标时，他会变得十分苛求和专注；普鲁斯特本质上是出于对绵延时间的着迷<sup>⑥</sup>，这也是整部《追忆似水年华》关注的核心<sup>⑦</sup>。

生活中的很多“不可见”，往往就存在于各种细节之中。它构造了大量的“闪念之间”类型的生活性事实。而普鲁斯特对于这类细节有着惊人的观察力。<sup>⑧</sup> 他擅长从最简单、最普通不过的事物中看到美（或曰事物的本质）。这些“细节”被普鲁斯特借助著名的“小玛德莱娜点心茶”这种“类物质”深度挖掘过，他还因此提出了“非自主回忆”这一记忆方法论。这些都有助于推进我们对记忆的微光的深入认知。他的传记作者亚当·瓦特指出，普鲁斯特作为作家的一个特性就是，经常性地将他自己“远超前人的智慧与敏锐”投入到任何他注意到的事物上；而引发普鲁斯特创作的动力来源中，除小玛德莱娜点心茶，还包括奥德耶的小山楂树和海维庸堡的玫瑰花等。<sup>⑨</sup> 普鲁斯特经常给予这些自然景观以足够多的时间去凝视，体验和发掘个体和这些客观事物之间的互动。当这些客观事物进入个体，就会生发出一种犹如小玛德莱娜点心茶一样的“类物质”，继而成为启动“回忆”的媒介。

通过一杯点心茶呈现出一个世界，就是“闪念之间”（对过去生活记忆的闪念）的作用结果。可以说，《追忆似水年华》就是这类记忆机制的产物，这种记忆机制被他称为“非自主回忆”。这是普鲁斯特找到的记录自我和世界之间关系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是他在不断摸索中形成的。他早期创作了很多速写、短故事和中篇，但这些都属于碎片集合式的写法，而不能拼接成一个整体，其中缺少情节、观点和结构；但早期的很

①②④ 马塞尔·普鲁斯特：《作者前言》，《驳圣伯夫：一天上午的回忆》，沈志明译，第4、4-5、1页。

③ 这里的理智指推理、逻辑推演，而非感觉、直觉。德·昆西在讨论麦克白的敲门声中，也提及这类借助逻辑理解力的方法，相比于直觉而言，是更不可靠的方法。参见詹姆斯·伍德：《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蒋怡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⑤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年，第52、56页。

⑥ 绵延的概念来自柏格森。参见柏格森：《物质与记忆》，姚晶晶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⑦⑨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85-87、66页。

⑧ 这种对细节的感受力和观察力应该与他的病体有密切关系。1911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总是病着，情绪低落，没有目标，缺乏行动，毫无志向，生命已看到尽头，又带给父母那么多悲伤，我很少感到快乐。”转自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90页。

多片段（如《让·桑德伊》）进入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成稿中。他还通过译注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的作品（这项工作至少持续了八年时间），去寻求合适的表达方式，结果也未能成功。<sup>①</sup> 透过这些“失败”的探索，我们能深切认识到其发现“非自主回忆”方法的艰辛。

普鲁斯特追索“细节”的持之以恒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在探寻生活机理时，这些“细节”正是结构化叙事的“血肉”，是人自内而外构建世界的立足点。

2. 以实地考察法为基础。

去捕捉记忆的微光也需要科学的精神。<sup>②</sup> 普鲁斯特为了抓住过去，除采用“直觉”方法外，还使用了一个经常被普鲁斯特研究者所忽视的方法——实地考察法，这体现出《追忆似水年华》的科学精神，即求真求实。

所谓求真求实是指他为了写作（捕捉生活）而对生活场景的细致入微处投以极大的关注，可以说曾经占据他身心的，他都进行了求实细致的梳理，如出席招待会、参加晚宴、欣赏音乐会以及进出歌剧院和剧院等，这些也都成为他的田野。在确定写作《追忆似水年华》后，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趁机询问友人早春时佛罗伦萨开什么花，商人是否会在维琪奥桥（Ponte Vecchio）上向人兜售、他们与巴黎商人有什么不同，还有关于圣母百花教堂（Basilica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中壁画的问题。他还与友人沟通制衣业和女装时尚的问题。如果他想把一次经验转变为一种印象，他必须用精确的词来表达，如果有什么是他不清楚的，他会查找文献，包括植物学、农业或时尚方面的资料。为了完成《索多姆与戈摩尔》，他通读了达尔文的《植物的力量》。普鲁斯特向很多人求助过，他曾说过：“我的书在修订时，有好多科学问题让人烦心。”其中包括鸡蛋的发育、太阳的运动、建筑学术语、透视法、玻璃的特性，等等。他还就园艺师、裁缝、天文学家和药剂师等问题，不断与友人通信。他与友人的通信越来越服务于创作的需要。<sup>③</sup> 为了修订《在少女们身旁》，在1916年初他还向女管家赛莱斯特的侄女借来论文大纲。普鲁斯特在1912年12月有一次出行，他在长睡衣外严严实实地裹了件毛皮外套，站在巴黎圣母院的圣安娜门外，仰望着上面的雕像。他和友人提到，巴黎人每日在雕像下往来穿梭，却从未想过为它驻足停留；而普鲁斯特在雕像下站了整整两个小时之久。《追忆似水年华》中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让他颇费思量。<sup>④</sup>

成年后，普鲁斯特一直喜欢通过搜集照片来构建个人档案，以保存一组永不褪色的回忆。从普鲁斯特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的观察、记录、分析、分类并力求掌握一切的意念。《重现的时光》中化装舞会的场景，在1909年已见雏形。为了重获新鲜的观感，他特意在久别后重返社交界，并发现故友容颜已老、不复当日。<sup>⑤</sup> 这构成了《追忆似水年华》结构的重要部分，即小说的圆环结构：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起笔，以“……在时间之中”收笔。基本思路在这一时期成型，从感知的丧失及其模糊蔓延，到重寻与恢复。1918年一战结束后，普鲁斯特对《在斯万家那边》做了一个最大的改动是地理编排（该书在1913年已经出版）；在修订版中，贡布雷不再位于靠近巴黎西南的沙特尔，而是在靠近首都的西北方，如此方便普鲁斯特把贡布雷正好安排在德军行进的道路上，以实现在《重现的时光》中对梅塞格利丝战役的叙述。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证明了他的小说里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有其复杂性。再如凡德伊奏鸣曲及其小小的乐句，来自圣-桑和弗兰克的奏鸣曲、瓦格纳的《罗恩格林》的前奏以及福雷的叙事曲等多重音乐元素的杂糅。<sup>⑥</sup>

当然，以实地考察为方法的小说文本，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叙事。如普鲁斯特所说，书中的人物，每个人都有8到10个原型，即书中的人物不存在绝对的原型。他称自己的写作是无体系的，情节发展是偶然性的，他创造的是一种炫目的无序，遵循的是文学建筑学的原则。<sup>⑦</sup> 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真实而热情的，“倾注了比我做过的所有事情都要多的心血”<sup>⑧</sup>。

笔者认为，这种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是探求“记忆的微光”的基本要求，而普鲁斯特的上述行为对此

①③⑧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89、127—128、142页。

② 这里的科学不是指上文提及的“理智”，而是“真实”（尊重事实，主要是情感真实）的另一种表达。

④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161、133—134、161—162页。

⑤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52、56、98、126页。

⑥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127、172—173、156页。

⑦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169—170、180页。

做出了一个最好的注解。事实证明，普鲁斯特的方法和实际操作说明了人类情感的“幽微”机制是可以被揭示的；而他作为作家就是人类的感官，因为他表达出了别人感受到却无法表达出的生活的真实。笔者也正是通过《追忆似水年华》中一些场景的描写，得以正视自己的类似情感。例如他在写外祖母去世时的场景以及他对外祖母的追忆（通过“弯腰脱鞋”这一非自主回忆的触发机制）。普鲁斯特正是通过求真的科学方法，将人类的“幽微”情感呈现出来，而这也是人类文明的隐秘之处，它是人类创造的起点，也是发动机。本文在这个意义上将记忆的微光视为文明的一种形态。“记忆的微光”属于通过探索“瞬间”的呈现或曰借助考察碎片化存在的方式，来发现人类文明奥秘的学术传统。它不同于宏大叙事所表达的文明形态，例如社会学经典三大家的现代性叙事。对于这种碎片化的探索属于另一脉络的学术传统，包括波德莱尔、本雅明、齐美尔等都在这一传统之中。尽管其在社会学中属于边缘的存在，但无法否定对这类现象进行探索的意义。

#### 四、记忆的微光与人的“自明”

借助记忆的微光，可以为过去松绑，从而让我们走出被束缚的过去，接近一个“自明”的世界。<sup>①</sup>通过“记忆的微光”，我们得以窥见人类情感的幽微之处，它作为人类文明的起点和动力机制，为我们理解人类文明提供了一个路径；同时，作为人之存在的一个特征，对其的清晰认识，也有助于人走向“自明”。

##### （一）记忆的微光与被遮蔽的过去

在被遮蔽的过去中，有快乐也有创伤，在这里主要指创伤。学界普遍认为，某种创伤记忆的束缚容易导致个体的精神障碍以及社会的撕裂。而创伤的释放就是为过去松绑，例如阿莱达·阿斯曼研究的二战后德国的家庭小说——达格马尔·雷奥帕特（Dagmar Leupold）的《战争之后》<sup>②</sup>，其中，追忆者试图为自己的过去松绑，作为纳粹（父亲）的女儿，在父亲过世后，她去重新梳理父亲的生活史，以重新理解父亲。如此，重建了一种新的社会联结。即便斯人已去，但对于生者而言，这些重建的联结，才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

在寻求创伤治愈的过程中，关键记忆需要被释放。这涉及记忆的微光的社会功能，即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重新建立联结。而在社会学角度，它提供了以个体进入社会的方式构建理论的途径。总体上，围绕“记忆的微光”的知识涉及个体记忆的被压抑状态及其解放途径。提出记忆的微光，就是试图找寻散落在各处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过去，它是构建自我认同的需要，也是建立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之间联结的基石，可以说，它是构建社会的人性基石。

关于此，后辈的“延迟的弥补”现象较为典型。在普遍的意义上，当我们的至亲去世后，作为晚辈的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去追忆他们。表面上看是我们在追忆先辈，本质上是在追寻自己何以成为自己，从而将自我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更为密切的联结，其呈现的正是回忆主体和逝去亲人之间的关系。在“我是谁”这一身份认同问题上，回忆主体将自我同最亲的人（父母和祖辈）建立起一种更为紧密的精神勾连。而且，其中的情感不仅是个体性的，也是社会性的。

这里以普鲁斯特的“弯腰脱鞋”为例，来阐述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具体过程。“弯腰脱鞋”的动作来自《追忆似水年华》中叙述者马塞尔第一次来到巴尔贝克海滩宾馆所发生的事情，彼时马塞尔是一个身心敏感的少年，他不能适应这里的各种情况，一心想着回家。年迈的外祖母在他身边悉心照料，毫无怨言，还弯腰给他脱鞋。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外祖母的身体已经不太好，她自己曾晕倒过几次，但还瞒着马塞尔。她晕倒这件事情，是在外祖母去世后，马塞尔从女仆弗朗索瓦斯和宾馆经理那里听说的。

“弯腰脱鞋”这一动作引发的绵延不绝的回忆来自马塞尔第二次来到巴尔贝克海滩宾馆时。只是这时外祖母已经去世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外祖母的去世对于他而言并未引起思想上的多大波澜，他甚至用“忘记了外祖母”这一表达。但显然并不是忘记，而是一种情感上的压抑。而“弯腰脱鞋”的动作如同来

① 本文在“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意义上使用自明概念。潘光旦曾深入讨论这一中国智慧。而且指出，走向自明，需要一系列科学的知识，在这方面，西方科学思维提供了重要帮助。但是，人文取向的知识更是不容忽视，潘光旦认为，文学提供了关于人性的知识，是建立人与人之间深层沟通的桥梁。潘光旦：《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再论解蔽》，《政学罪言》。

② 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袁斯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自过去的一束光，提醒了马塞尔，外祖母在世时对他的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他深刻体会到，外祖母在世令他身心舒适，具有无限的安全感；外祖母去世后，这一关系在世界上永远消失了。这束回忆之光释放了外祖母去世带给他的情感创伤，让这种创伤从压抑状态中走出来。

“弯腰脱鞋”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追寻自我认同，以及重塑自我和长辈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追忆了外祖母对他的关爱，还回忆了外祖母宽宏大度的人格（关心家人、宽容别人），他想到自己的宽容品格也受了外祖母的影响（例如他对仆人儿子莫雷尔的宽容）。可以说，这一记忆的微光，建立起了他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并明晰了一些有关自我的知识（我是谁，我的特性来自哪里），呈现了主体与社会间建立关系的过程。而普鲁斯特在直面这一“记忆的微光”的过程中，舒缓了外祖母去世带来的创伤，这是自我救赎的一个比较实用的方法。

在广泛的意义上，子辈对去世父辈（祖辈）的追忆，一方面有心怀愧疚的机制（所以才会有“延迟的弥补”），另一方面有探索自我成长历程（认识自我）的冲动。笔者认为，生命史是构建社会史的核心，它呈现出自内而外的方式，表达的是人心，社会心态就是构筑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 （二）自内而外建构的方式与自明

笔者认为，捕捉记忆的微光，有助于走出“被束缚的过去”，成就一个健全的人格，进而以此为基础助力于美好社会建设。而这一过程是经由“自内而外”的方式来完成的。其中，成就健全的人格中，获取有关人的自明的知识是关键。

这一问题也涉及对《追忆似水年华》的总体性认识。那么，普鲁斯特建构的《追忆似水年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本文认为它提供了自内而外构建世界的一个典型案例。普鲁斯特认为，重要的是内在的深层自我，这是人们努力保持的东西。他希望自己的书要让“尽可能多的敏感的心灵读到”<sup>①</sup>，且需要的不是观察所见的东西，而是复活我们的感受，后者才是唯一真正有意义的现实<sup>②</sup>。

在1915年，他给友人写的信中提到，“我渴望我能完成这部小说，记下我所知道的真实。它将滋养许多人。如果我不这么做，它将随我而逝”<sup>③</sup>，“记下我所知道的真实”这一内在视角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建立在“生理学的真实、人性和情感的真实”这一基础上<sup>④</sup>，亦来自作家普鲁斯特对人类存在有限性的敏感<sup>⑤</sup>。笔者认为，通过“复活感觉”的方式，普鲁斯特建立了如何到达“自明”的方法，这便是对“自我”的再发现。

这种“自明”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普鲁斯特对出版商的要求是，仅仅保证“在这部从我身上长成的作品里……一切我的隐秘想法和感受都是安全的”<sup>⑥</sup>。普鲁斯特的评论家马尔科姆·鲍义（Malcolm Bowie）指出，普鲁斯特描绘出一幅“孤独的、高度敏感而又善于沉思的心灵肖像”。而《追忆似水年华》这一涉猎广阔且向内心深掘的惊人作品的完成过程，需要的是全身心的奉献。普鲁斯特自己也说，这是一种“能够用来为他人谋福利的个人主义”<sup>⑦</sup>。人们借助普鲁斯特的作品，认识到了一些没有这部作品便可能无法认清自身的那些东西。

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写道，艺术家的作品是自我的一个产物，普鲁斯特坚持自我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多元的观点。对于艺术上的自我，他认为，作家必须避免陈词滥调，以配得上作家这一称呼。也就是作家必须使用自己的语言，因为只有那些标识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语气、我们的不确定性，以及我们的愿望和我们的不足的语言，才是美丽的。<sup>⑧</sup>

值得指出的是，普鲁斯特所认识到的自我，不仅是与外在世界碰撞的产物，也是自身负罪感的产物。死亡、道德、（同性恋）伦理困境是他在追忆中不得不面对的主题。可以说，死亡构成了其伦理困境的重要主题。《追忆似水年华》中最动人的篇章便是外祖母的去世及其追忆。如前所述，其中的一个细节是，当他重复很久前外祖母为他弯腰脱鞋的动作时，不经意间，喷涌而出的悲伤将他淹没。据考证，外祖母去世时，普

①③④⑤⑥⑦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126、155、101、84、162、203—204页。

② 马塞尔·普鲁斯特：《作者前言》，《驳圣伯夫：一天上午的回忆》，沈志明译，第2—3页；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105页。

⑧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70、39、111页。

鲁斯特未能在身边，《追忆似水年华》中对外祖母去世的书写应该是调用了他在1905年陪伴母亲度过最后时刻的感受，当然也包括亲人们去世后带给他的伤痛。在生命的最后几天，母亲最担心的却是自己走后普鲁斯特是否有能力独自生存下去<sup>①</sup>，这让普鲁斯特痛不欲生。他对友人说：“她把我的生命也一并带走了，就像父亲带走了她的生命一样。”<sup>②</sup>

体认死亡是普鲁斯特认识自我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写作《追忆似水年华》之前他就曾几次写过死亡话题。<sup>③</sup>而生活中的真实死亡第一次发生于1896年，这是他外叔祖父的死亡；1903年他的父亲去世；1905年母亲去世。1907年，普鲁斯特认识的一个家族的孩子，杀死他的母亲后自杀。普鲁斯特应《费加罗报》之邀，写了一篇评论《一个弑母者的孝心》。普鲁斯特的研究者认为，这是普鲁斯特写作史中的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其中涉及了他关注的所有问题——回忆与过去的联系、孩子与父母的关系、罪过、补偿，等等，这些都是《追忆似水年华》探索的主题。<sup>④</sup>

普鲁斯特亲历的死亡还包括重要友人的死亡。给他伤害最深的是1914年他的司机阿格蒂斯里的死亡，他死于飞机事故。普鲁斯特产生了沉重的负罪感，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现在总忍不住懊丧地想到，如果他不曾遇见我，如果我没有给他那么多钱，他根本不会去学开飞机。”<sup>⑤</sup>有关此的情感叙述构成《追忆似水年华》中《女逃亡者》的主要内容。他在此后两年里构思了这卷书，其中描述了爱情、失去与痛苦。1915年他面临着战争带来的友人的罹难，例如贝特朗·德·费纳隆的死讯，他死于一颗穿过头部的子弹。普鲁斯特一直以为自己由于身体状况会是友人中第一个离世的，现实让他认识到战争与死亡的不公。<sup>⑥</sup>

当然，在直面死亡的追忆中，《追忆似水年华》中最能打动普通人的是他对去世外祖母的追忆，这一追忆呈现了如何“自内而外”构建一个世界的过程。“延迟的弥补”是典型的形式，表达了时间维度上的代际关系，专注于生死记忆的交流层面，是记忆研究的伦理视角。<sup>⑦</sup>在这一维度上，呈现了一个主体内在的自我建设过程，以及该主体与社会关联的问题。

这一主体的自我建设涉及以下关键问题：“被束缚的过去有待解放，我们的人心需要抚慰。”而得到抚慰的前提是，增加这方面的自明（自知之明）的知识，从而可以自我控制；这涉及个体和社会间的关系处理，也关涉社会心态、社会建设等问题。

探求“记忆的微光”让我们专注于自内而外的构建方法，让人获得关于生活/生命方面的“自明”的知识，走出“被束缚的过去”，从而在这个社会中，获得个体的“位育”，让个体得以安所遂生<sup>⑧</sup>，由此基础上，积极参与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自明是其中的关键机制。自明在这里就是认识自己。“自明”也需要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当然也会有道德指引，这些都在普鲁斯特的文学记忆中有所呈现。他紧紧抓住“记忆的微光”，表现为他强调的启动“非自住回忆”的过程。当在小玛德莱娜点心茶的气味和滋味出现时，普鲁斯特在情感上体认到了追寻过去的线索，同时他也借助了“理性”的力量（指有意识地紧紧抓住这一闪而过的线索/“光”），得以探明这一“气味和滋味”的源头——来自童年时期在贡布雷的姨妈家度过的美好时光，由此他复活了在贡布雷的童年。通过“记忆的微光”，普鲁斯特借助不懈努力复原的生活包括个人生活史中的“史实”，例如童年时期的亲戚关系、友人关系，但这属于“物”的层面的真实<sup>⑨</sup>，事实上普鲁斯特并不是特别看重这一点。

他更看重的是情感层面的真实，这涉及历史性的知识。它是通过回忆构建出来的，是一种建构性的历史真实，其中势必关涉由于“切入点”不同而导致结果不同的问题。即不同人的感受和立场是不同的，例如罗生门便是如此。普鲁斯特在自己的角度，保证了情感真实，很大程度上，这是存在于个人观念层面的，展现的

① 普鲁斯特一辈子都没亲自整理过床铺，服役期间，面对毛毯和床单他始终束手无措，一夜过去，他常常把这些弄得一团糟，自己则睡在床垫上。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71、48、169页。

②③⑤⑥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99、71、148、153页。

④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104、113页。

⑦ 而记忆研究的科学视角强调的是真假问题，往往无关伦理意义上的对错。

⑧ 安所遂生，潘光旦语，出自潘光旦：《位育？》，《潘光旦文集》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⑨ 其中有一种“幽微机制”，一般经由文学家的提醒和放大，可以让普通人看到自己先前没有意识到但客观存在、且对自己已经发生影响的东西。

是个人的整全的历史，包括主观和客观。而情感方面的事实，事实上也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它存在于精神层面。

更确切地说，普鲁斯特是在历史性层面求真，并获得自明的知识。表现在当他得知滋味和气味来自童年时期的贡布雷时，他真切触及到了“我来自何处”的知识。他通过对童年世界的再理解，从而寻得了生命/生活的本质。由逝去的时光构成（即经由“记忆的微光”扩展而成）的，不仅是个人生命史，也是社会（关系）史（由亲人、朋友乃至社交圈中的人际关系构成），直指人与社会互动的历史。

普鲁斯特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体验到了时间的真理，个体由此获得解放。他通过追忆，明白了“时间之于人生的道理”，这便是：“流年”似水，时间是变动不居的；被追忆的个人/社会品质则是相对不变的，他在书中记录了影响自己一生、让自己成为自己的那些人和事，事实上他写的是这些人的品质，例如外祖母的品质，而这也包括了那些社会所赞赏的和能够流传久远的，也是涂尔干所谓的“社会精神”。<sup>①</sup>

这种发现类似于叶芝所说的“随时间而来的智慧/真理”：“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sup>②</sup> 这里的“真理”在本文的语境下可以理解为，认识到了什么是生活的品质/本质，告诉我们该如何生活：认识到生命过程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可以忽略的、什么是需要抓住的，从而可以由“自我认识”阶段进入到“自我控制”阶段，这也是潘光旦所说的“人的科学”的核心部分。<sup>③</sup> 在这一基础上成就一个健全的人格。

位育之学是潘光旦所强调的，即安其所、遂其生，来自中国古典人文思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这一思想经过潘光旦的“科学化”，成为其“人的科学”的基石，当然也带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个体安所遂生，社会才会和谐有序。可以说，人的科学的核心就是“位育”；而只有从个体入手，才能真切达到“自我认识”，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在完成“位育”的过程中尤为重要。探究“记忆的微光”所彰显的自内而外的认识自我和世界间关系的方式，正构成“位育”之学的组成部分。

## 五、结论与讨论

“记忆的微光”呈现了一种自内而外构建社会的知识图式，描画了人类文明和知识生产的幽微机制。而《追忆似水年华》为“记忆的微光”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解释上的范例。可以说，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展现的是一种发现世界真理的方式，这是一种“感觉”（也可称之为“直觉”）的方式，它不同于社会科学专注于“客观事实”的外在探究方式。普鲁斯特坚信，真正的作品不应是光天化日和夸夸其谈的产物，而是黑暗与沉默结下的果实。<sup>④</sup>

普鲁斯特循着“非自主回忆”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自明，发现了人之生命和世界间关系的一个真理：“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失去了的天堂。”<sup>⑤</sup> 其小说的一个主题是：随着时间流逝、死亡临近外，什么都没有改变，这同时也是一个残酷而美丽的自然节奏：时间具有“懵懂无知的流动性”特征，紫罗兰还会再开，苹果花还将盛放，此前仍然少不了寒霜降临，但世间再也不会再有贝特朗（指贝特朗·德·费纳隆）了。<sup>⑥</sup> 这一经由“自内而外”方式建构的自明的世界，所包含的不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在人与社会之外的关系，如人与植物、乃至宇宙，体现的是人之存在的处境。可以说，记忆的微光中，有痛苦的，也有快乐的，还有无关宏旨的。它呈现为碎片状态，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本文对此有以下几方面的结论和相关讨论。

第一，“记忆的微光”依靠人性幽微机制发挥作用，可解放被束缚的过去。这一过程需要的主要不是“理智”，而是涉及一种情感的秘密。本文提及其中的一部分，这便是捕捉“记忆的微光”，让记忆复活，它是自我救赎的方法和途径。通过对记忆的微光的捕捉，可以让人达致自明，或者说，这是人反思自我的一个结果。经由自明，才能建立起一个较为健全的人格，这是建设美好社会的人性基础。

①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② 叶芝：《随时间而来的智慧》，王家新编选：《叶芝文集》卷3，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③ 潘光旦：《派与汇——作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的序》，《政学罪言》，第130页。

④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7卷，徐和瑾、周国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161页。

⑤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7卷，徐和瑾、周国强译，第175页。

⑥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160页。

记忆的微光发挥作用的一个过程是放大人性的幽微之处，将“微光”所牵扯的部分（根系）表达出来，可借助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机制，借助一个外物的偶然激发，让过去涌现出来。主体借助的不完全是理性的力量，而是过去一个物件在当下的遗存，循着蛛丝马迹，我们去找回支撑生活/生命的本质。

而主体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转变，其中之一是自我的提升。即便叙述者马塞尔的外祖母已经不在人世，但其优秀品质依然影响着子辈和孙辈。伴随着思念，去世外祖母的品质在叙述者马塞尔身上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如“宽宏大度”、喜欢塞维尼夫人的语录，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外祖母精神世界的影响。追忆者美化了逝去亲人的言行，其沉淀为追忆者生命的一部分。而且，在遗传学角度，这种沉淀或继承还有着生物学上的基础，即我们在某些方面和去世的先辈变得越来越像。

第二，记忆的微光作为文明形态。普鲁斯特所说的幸福的瞬间，如再次品尝小玛德莱娜点心茶的气味和滋味，成为生活的动力，也是生命之美的秘密。如果说“无事件境”归属于某种社会处境的特征，记忆的微光则归属于生活和生命本身，这两个概念涉及人与社会间关系互构的不同层面，但都是文明形态之一种。“记忆的微光”是这样一种文明的形态，它深藏于人与社会的互动之中，立足于人自身，且通过自内而外的方式，成为构建自我和社会/世界间关系的方法。自我内在于文明之中，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最具根性的力量，其他力量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第三，文学与社会学间的对话。观察“记忆的微光”这一现象，探求其发挥作用的“幽微”机制，很多时候需要借助文学叙事。但我们说明的并不是文学性的问题，而是社会性与人性间的关系问题。无疑，文学是描摹人性的最好叙事载体，人性与社会性间的关系问题绕不开文学与社会学间的对话。“文学”记录的是生活中的不同层级的现象，且提供了让某种感性（直觉）得到深入阐发的可能性。它关涉的是主体和社会互构中的精神层面的范畴，关于此，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有过很多讨论，他强调文学对于理解“生活性细节”的意义<sup>①</sup>；社会学家潘光旦谈及文学对于认识人性的重要性<sup>②</sup>；费孝通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也提及了文学对于认识社会性的必要性<sup>③</sup>。

对“记忆的微光”的探索，就是在社会学角度回应什么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是为了走向一种人生之“真”，世界之“真”，甚至文明之“真”。它是人性或生命本身与社会性之间的互动。对文明研究的最深层在于对人性的探究，而非器物、组织制度。社会学的主流是对人的社会性进行研究，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人自有其自发萌动的生命状态，这才是人之存在本身，不过对于人之存在本身的探索属于另类、边缘化的社会学叙事。

记忆的微光具有尼采意义上的“永恒轮回/同一”的意味，就在于记忆的微光实际上就是一个瞬间，我们说它是瞬间，来自时间上的定义；但如果瞬间有了意义，那么瞬间就有了超越性，这个瞬间就可以永恒，它的存在就是非时间性的、去历史化的。尼采的“永远同一的永恒轮回”被学者们认为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永恒的复归，这是虚无主义的极端形态，永远没有意义，而是空洞的持续；第二种，极小的时刻是最高的现实，真理是永恒之流中一道耀眼的闪光。<sup>④</sup>记忆的微光属于第二种可能性。瞬间，难道一切事物不都是这样紧密衔接，以致这一瞬间将一切要来的事物拖在后面吗？难道以前不是已经到达这里了吗？<sup>⑤</sup>我们在这一时刻成为永恒，无论是在品尝小玛德莱娜点心茶的时刻，还是在“弯腰脱鞋”的时刻。

借助对“记忆的微光”的探索，以回应现代性进程中意义丧失和个体控制丧失的问题。微光作为联结过去的“微型的无形丝线”，作为稍纵即逝的瞬间，可以成为现代性的一个表征，同时为认识社会提供了一个“切口”。碎片不仅能够成为社会学学科思考的出发点，而且社会学可以借此思考人之生命与社会本质之间的关联。在本体论意义上，不存在一个此重彼轻的碎片的等级。每一个碎片，每一个社会快照，它们自身都包

① 詹姆斯·伍德：《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蒋怡译。

② 潘光旦：《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再论解蔽》，《政学罪言》，第77页。

③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④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第47页；何兰芳：《伟大的风格与永恒轮回》，《外国美学》2015年第1期。

⑤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第47页。

含着昭示整个世界的总体意义的可能性。<sup>①</sup>

值得指出的是，主流社会学多关注物化的社会概念，如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系统，等等。但是在物化的现实中，人的内在是孤立无援的；物化的思路也无助于人之内心的抚慰和满足。而另类叙事如探索“现代性的碎片”思路，就像尼采所说的，采撷一个尽人皆知的、也许是普通的题目，充满灵感地去改变它、增强它，将其提升为无所不包的象征，并且让人在这个原始题目里感到一个深奥、有力和美丽的整个世界。<sup>②</sup>这也是“记忆的微光”试图努力践行的方法论。

社会学者该如何去分析看起来是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和偶然的现象，并捕捉现代生活的转瞬即逝的景象呢？探索这类现象必然要引发新的方法论问题，就像西方社会学发展早期的社会学家齐美尔，他把类似波德莱尔的现代体验带入社会学研究中，在那个时候他就在着手推进非正统的社会学方案，尽管这完全取决于社会学家体验社会现实的特定形式。简言之，这一方案认为“碎片”能够反映“整体”，而单单一门科学的立场，永远不会穷尽现实的总体性。齐美尔深信，一个人，一片景致，或者一种情绪，生活的细节、表象，是有可能与最深奥、最本质的运动联系起来的。<sup>③</sup>当然，实施这种方法一定要有某种“超越”的视角。这一派学人认为，经验科学研究是有局限性的，它不能接近总体性，这一总体性需要通过某个细节去揭示；而且，无论从哪一点出发，它总是需要一个“跳跃”或提升，无论是宗教的、形而上学的、道德的亦或美学的。唯有如此，才能将碎片化特征扩张并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在方法论上，齐美尔认为，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生命的总体性，因为总体性不在个体元素之外存在；我们的知识碎片总是不完美地接近总体性。“记忆的微光”在这一意义上，既是现代性的一个表征，也是认识现代性的切口。尽管作为这种知识基础的直觉主义，很难成为现代社会学发展的坚实基础<sup>④</sup>，但它也引起了更多社会学家的关注<sup>⑤</sup>，为今天社会学之界限扩展提供了一个值得继续开拓的路径和指引。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潘光旦社会学思想研究”（21BSH026）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朱颖）

## Glimmer of Memory: An Entry to Understand Society and Its Memory

LIU Yaqiu

**Abstract:** The study of “glimmer of memory” originated from the oral history research practice in sociology, which is used to depi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and to explore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the “glimmer” that flashes between memory and forgetting. “Glimmer of memory” is deeply hidden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society, based on people themselves, and through the efforts from the inside out, it becomes a path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society/world. The self is inherent in the civilization, and it can also be said as the most fundamental force of civilization. Other forces grow on this basis. The memory subject mainly relies on the current remains of a past object instead of rational power, and follows clues to find the essence of life. This process presents a knowledge schema that constructs society from the inside out, depicting the subtle mechanis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Key words:** glimmer of memory, from the Inside Out, intuition, self-awareness

①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第74、77页。

②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第72、150、45页。

③ 西美尔：《序言》，《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第3页。

④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第54、55、64—65、66—67、70页。

⑤ 例如费孝通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强调了这一方法的学术价值。参见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